

# 《面纱》的他者形象解读

周子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DOI:10.12238/pe.v2i2.7220

**[摘要]** 《面纱》以英国女子凯蒂的成长为故事核心,通过瘟疫这一灾难描写,突出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主体身份,中国等殖民地的他者形象。在西方建立的二元对立体系中,东方象征着非理性与女性,是“他者”的代表;而西方象征着理性与男性,是“主体”的所在。东方在西方眼中往往是沉默的失语者,扁平化且带有刻板印象;女性则作为男性的附庸,无法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重新解读《面纱》中的他者形象。

**[关键词]** 《面纱》; 他者; 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44.5 **文献标识码:** A

## Images of the "Other" in "The Painted Veil"

Ziyuan Zhou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The Painted Veil" takes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woman, Kitty, as the core of the story. The description of this plague highlights the "savior" statu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redeemed" image of colonies such as China. In the dichotomy system established by Western culture, the East symbolizes irrationality and femininity, and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ther"; while the West symbolizes rationality and masculinity, and is where the "subject" lies.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Chinese people are often silent aphasia, flat and stereotyped; women are subordinate to men, cannot achieve true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This article use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Feminism to reinterpret the image of the "other" in "The Painted Veil".

**[Key word]** The Painted Veil; the other; post-colonial criticism; Feminism

### 引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曾到访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此背景下创作出小说《面纱》。故事以英国女子凯蒂的成长为核心,通过瘟疫突出当时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救世主”身份,以及中国等殖民地的“被救赎者”他者形象,展现出东方在西方眼中往往是沉默的失语者,扁平化且带有刻板印象;女性则常常作为男性的附庸,无法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毛姆作品中的东方文化,突显出以西方和男性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作品中东方与女性的边缘化,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视角。在以西方文化为主流价值观的世界文学里,西方建立的二元对立体系中,中国即东方象征着非理性与女性,是“他者”的代表;而西方象征着理性与男性,是“主体”的所在。当前,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强化中国文学主体性的要求迫在眉睫,亟待重新解读西方文化中的他者形象。

### 1 后殖民主义与《面纱》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在现代汉语中是地理范畴,但随着西方实现工业革命,

踏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全球建立殖民地,“东方”开始具有政治概念与文化涵义。到19世纪,西方殖民国家则直接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荒蛮和文明。<sup>[1]</sup>赛义德在其著作的《东方主义》中首次提出“殖民话语”概念,即西方将东方视为“他者”,本质是文化中的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上对东方加以表述。<sup>[2]</sup>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实质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和文化霸权主义,这种文化霸权首先会创造一种“想象的地理学”,从文化上建立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在西方文化霸权价值体系下,东方通常是非理性、堕落与女性化的形象;西方则是理性、成熟而男性化的形象。西方在文学作品中将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异质化,让“东方”成为全球格局之外的“他者”形象。

《面纱》里对中国人的歪曲丑化描写,就展现出了西方视角下中国的“他者”地位。在《面纱》中,毛姆描写凯蒂“来湄潭府的途中她早对中国城镇肮脏不堪的街道司空见惯了。”<sup>[3]</sup>这座城市狭小拥挤,昏暗压抑,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死亡阴影。整座小城的庙宇布满灰尘,唯有法国修女所在的修道院充满光辉,暗示

着东方是亟待西方拯救的没落文明。村民虔诚供奉的庙宇破烂不堪,无人管理,逐渐成为精灵鬼怪的藏身之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象,凯蒂眼中的中国庙宇和牌楼却充满肃杀之气,令人畏惧。寺庙道观是中国人祭祀祈福的地方,充满喜庆与欢乐。但在瘟疫肆虐的涪潭府,这些建筑破旧不堪且萧条。而法国修女在中国所吃的食物,一般的法国农民都难以下咽。在毛姆笔下的中国人无法获得中国神灵的庇护,只能在西方修道院里寻到“避风港。”这样看来,毛姆对中国文化的异质化描写是西方霸权文化下对中国形象的曲解和不实描写。

《面纱》中的中国人,在毛姆笔下也是沉默无言的形象。无论轿夫、孤儿院的女童或者唯一带有姓氏的俞总督,都被边缘化,成为没有形象刻画、没有声音、没有话语权的人。孤儿院被丢弃的女婴们,在凯蒂眼中“活像一堆小虫子”。“她们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面黄肌瘦,身同侏儒,鼻子都是扁扁的,几乎没有正常人的模样,一看便令人生厌。一张张中国人样子的小脸古怪有趣,皱巴巴地扭出了苦相。她们不像人类,而是某种罕见的不知名的动物。”法国修女则作为西方人的代表,收留这些女婴并给予她们无私关怀,衬托出20世纪初中国清朝社会的封建愚昧,进一步说明在西方价值体系下,中国的未开化与落后。<sup>[4]</sup>在这样带有明显偏见色彩的书写下,中国成为非理性、堕落、且女性化的形象,象征着西方文化二元对立体系中的“他者”,没有话语权,逐渐被边缘化。

此外,毛姆还描写了一位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国满族公主。“黑色的头发按照满人的风俗盘成发髻,上面镶了繁多的饰物。她的脸上涂了一层胭脂,脸颊从下眼皮到上嘴唇抹着厚厚的红粉。眉毛明显拔过,只见一道黑色的细线。嘴唇涂得血红。”毛姆描写这位中国女性的浓妆艳抹,带有嘲讽的语气,“与其说这是一张女人的脸,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木偶。”满族公主作为中国传统大家闺秀的代表,却极度依赖着来自西方的英国助理专员韦丁顿,仿佛意指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需要依靠现代化的西方才能存活。虽然满族公主展现出毛姆对古老神秘东方的向往,但英国人韦丁顿冷漠的看待妻子满族公主吸食鸦片,认为她是无法脱离自己生存的依附者,都体现出西方中心论的观点。

简而言之,毛姆在《面纱》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是西方霸权文化体系下虚构出来的,与真实的中国形象存在很大差别。毛姆笔下的中国落后形象是由文化语境筛选后对西方文明优越的彰显。毛姆通过他者叙事将中国人丑化和异化,说明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下,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不屑一顾,将中国构建为愚昧无知的落后形象,并将对中国人的非人性描写纳入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框架。<sup>[5]</sup>在西方文化霸权体系下,中国人是野蛮、冷漠,没有话语权的未开化群体,没有思想个性且面目模糊;西方人则是充满人性,有血有肉,音容笑貌完备的生动形象,是拯救中国于黑暗之中的“圣人”。在如今全球化加速的新时代,这类西方“他者”思想已成为精神糟粕,西方应当承认中国文化的崛起以及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底蕴。东西方学者都应以世界为格局,重新诠释东方文学与东方主义。

## 2 女性主义与《面纱》中的他者形象

波伏娃是现代妇女运动最早的理论家,其撰写的《第二性》是存在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撑。《第二性》的显著话语包括“内在性”、“他者”和“超越性”,主要从性别身份的差异来反思社会问题与文化不足,同时提出女性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行方法论。<sup>[6]</sup>波伏娃认为,女性并非先天的性别,而是后天所形成的。尤其是20世纪以前,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通常要求成为贤良淑德的角色。就如《面纱》中的凯蒂所言:“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养长大的,我身边的所有女孩都是如此……你不能强求我不具备的东西……我有的仅仅是可爱漂亮,天性活泼。”这从侧面表明,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环境下,不仅没有追求自身独立的自由和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权利,还需要特意迎合男性“主体”的喜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丧失话语权的“他者”。

女性从一开始就有自主生存和“做他者”(being-the-other)之间的矛盾。当女性对世界的了解越少,她的自由也越少,更加难以确定自身的主体性。20世纪以前,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社会剥夺了女性独立思考、拥有知识和受教育的权利。凯蒂没有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和规划,更谈不上理想和追求。在《面纱》中,凯蒂从小就频频出入各种舞会,努力结识各种权贵。此外,对于凯蒂的父亲,母女俩也一直把他作为提供生活资金的来源,当父亲的工资下降,母女俩便露出冷淡的神情。父亲的角色在凯蒂的成长阶段是缺失的,父亲应当承担的责任和教育都随之隐形。相应地,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了凯蒂对世界的认知。

为了得到尊重与爱,女性只有在自我牺牲中得以自我实现。波伏娃对女性的依附性这样描述,“不论她可能得到怎样的尊重,她终归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她背负着一大堆灾难,那是由于她无法掌握自己生命的真谛。”<sup>[7]</sup>凯蒂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同龄女性亲眷,都在遵循着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结婚生子成为她们人生中的重要比较筹码,也成为了女性随波逐流的一大压力。凯蒂选择嫁给沃尔特,也仅仅因为妹妹已经出嫁,沃尔特是当前能提供生活保障的最佳人选。沃尔特始终以个人想象来建构理想中的妻子,当凯蒂没有满足期待,就对她进行言语上的讽刺。凯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日复一日地对世界丧失探索能力和兴趣,也没有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与见解,无法从外部获取资源来寻求自身的发展。

在《面纱》中,作为女性的“他者”困境,也同样出现在中国满族公主身上。毛姆从头到尾没有给予这位中国女子姓名,对她的描写聚焦在外貌以及东方特征上。满族公主不仅没有姓名,也无法开口说话,被当作观赏物一般展览。其被赋予的意义是东方文化的缩影与温顺贤良女性的代表,是处于失势的“他者”群体。在这样的文本语境中,女性是不确定的,且没有自我身份,是以他人价值为衡量标准的群体,她们是不完整的自我,是被边缘化的“他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潜移默化地接受男性构建的社会制度,也确认了男性的主体地位。

在《面纱》中,凯蒂作为典型的“他者”,也存在主体意识的觉醒。最初,凯蒂跟随沃尔特来到香港远离英国,只是对其所

处现实的逃避,躲开母亲的指责与脸色。而后在涪潭府的所见所闻与各种遭遇,促使凯蒂的人生价值观发生改变。在看到法国修女们对孤儿院所作的无私奉献时,凯蒂开始决意发挥自身力量帮助当地受苦受难的民众,其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在涪潭府经历诸多后,凯蒂本能地开始珍视生命,在修道院帮忙的过程中学会了关爱他人,并从修女和他人的反馈中感受到认可与关爱。凯蒂由此踏上寻求自我独立的道路,升华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婚姻与情爱之中。当沃尔特不幸感染霍乱去世,凯蒂怀着身孕回到英国决心独自将孩子养大,体现出凯蒂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超越。

### 3 结语

在西方所构建的殖民主义文化下,中国一直处于失语的“他者”地位,充满被误解的“落后愚昧”文明。而与之形成对比的便是进步的现代西方文明。生活在20世纪西方文化霸权社会背景中的毛姆,无法摆脱对东方文化的偏见与误解。中国人在《面纱》中是被丑化的扁平化角色,特征单一而模糊,彰显出东方的“另类”与边缘化。与此相呼应的是《面纱》中的女性角色,无论是女主人公凯蒂还是满族公主,在男性拥有话语权的社會中,毫无自我意识与个人独立性,同样处于“失语”的他者地位。这种“他者”形象,为真正的东方与女性添上了一抹神秘的面纱,充满西方意识形态的想象与歪曲。

如今,东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日益密切,从相互竞争到发展共赢,亟须东西方国家平等交流、求同存异,突破西方建立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文化模式。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女性也逐

步取得政治、经济等权利,开始掌握话语权并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二元对立的“他者”体系逐渐瓦解。就世界文学而言,颠覆东西方不平等结构与国家权力关系,增添更多非西方国家文化精神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随着中国民族文化愈加自信,我们应当指出西方文学中他者叙述存在的问题,找到全球话语体系下的平等话语权与文化主体性。

### [参考文献]

- [1]朱刚.政治词语词语政治——一个赛义德后殖民主义个案研究[J].外国文学,2002,(4):65-71.
- [2]石子娟.论后殖民语境下的新闻翻译[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116-119.
- [3]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彩色的面纱[D].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 [4]余畅.毛姆与东方主义——毛姆的中国书写[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6,18(1):83-87.
- [5]尹萍,李莹,栾颖.毛姆长篇小说的中国书写论略[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09-112.
- [6]景莉莉.毛姆《面纱》中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解读[J].现代语文,2017,(9):54-55.
-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D].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 作者简介:

周子嫒(1997—),女,汉族,重庆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